

**罗瑞卿：《关于公安部整风运动的情况和当前的任务——1957年10月19日
罗瑞卿同志在公安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纪要》**

〔《公安建设》编者按：这边报告纪要是公安部整风办公室根据记录整理的，未经本人审阅。小标题也是公安部整风动态编者加的。〕

同志们：

关于全党、全国的整风运动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已经作了专门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当前整风运动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估计和深刻的分析，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对今后的方针、政策和作法都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报告，今天已在报上发表，希望大家很好地学习。我今天向同志们报告一下关于公安部整风运动的情况。当然公安部的整风运动不是孤立的，许多情况都正如小平同志所分析了的。小平同志的报告和分析，也是完全适合公安部的情况。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公安部的整风运动从五月初开始，经过传达和学习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于五月下旬进入大鸣大放阶段。公安部全体同志，在一个多月的鸣放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如座谈会、小组会、大组会、大字报、小字报——“整风动态”等等，对领导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改进领导、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意见，一共有两千四百多条。

但是，在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鉴整风机会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我们机关内同样也暴露出了一批右派分子，这是我们在当时没有想到的。那时，我们的想法，觉得右派是有的，报上已登了，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竑、葛佩琦等等，这是不用怀疑的。公安部有没有？我们原来想公安部党、团员多，搞了七、八年了，又经过了多次运动，大概不会有吧。如果有，也不多，并且至多不过是个小右派渣滓。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想法不对。

这些右派分子，同党和人民完全处于敌对地位。我们说整风，他们说下台；我们说整顿作风，改正缺点错误，他们就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不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说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说共产党搞不下去了，得要他们出来收拾局面。他们说要杀共产党员，“中国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中国人民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什么“党天下”，“大和尚，小和尚”，什么“政治设计院”，“平凡委员会”等都出来了。这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息”。我们整风，吹阳风，公开吹；他们则烧阴火、吹邪风、吹反风。我们烧的是阳火，烧掉三个主义，叫作除三害；他们则烧阴火，想乘机把我们推翻。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等等很不服气，称之为“太岁头上动土”，说“这一下老子可得整你们一下”。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全世界的反共潮流、波匈事件，我们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都认为是我们不得下台的事情，老百姓

都反对我们，加上整风，他们就以为时机到来了，牛鬼蛇神一齐出动。过去以为章伯钧是左派的，这次也暴露出来，原来是个老右派、反动政客、流氓，历史一翻，丑恶的很。至于黄绍竑、罗隆基、章乃器之流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熟悉。我们整风，他们进攻，进攻的目的就是要复辟，要推翻我们，就是要把新中国拉回旧中国的地位。他们到处煽动、点火，对象首先是几百万知识分子、大学生。在一个短时期内，一部分左派惶惶无主，中间分子动摇，讲中国共产党天下不长久。中国天空一时乌云乱翻，乌烟瘴气，好像有点暗无天日的样子。资产阶级右派极力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政反、肃反，民主集中制。究竟我们过去革命对不对，建设是不是正确的，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专政，我国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等，都成了问题。

在新闻界，他们全部篡夺了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把党员赶了出来。新民晚报、大公报、新闻日报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在学校，刘奇弟、谭天荣、林希翎等等有名人物，神气得很。林希翎出入还有人替他保镖，进出是前呼后拥。

在民主党派中，最坏的是民盟，其次是民革和九三学社。

在国家机关、科学技术界、医药界，也都出了不少问题。文化界这回也出了大事情：丁陈反党集团，还有冯雪峰、江丰。政治法律界的情况更是恶劣的很，除公安系统的右派以外，司法系统有一批大知识分子，旧法人员，死抱着六法全书攻击我们。国务院参事杨玉清（曾任国民党司法行政部次长）公开要我们下台，他们上台，他们讲工农干部不行，不懂业务，用一切办法加以丑化。现在已经揭发出来，很多旧法人员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许多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的案件，有一些就是这些右派分子搞得，他们利用职权，有意包庇反革命和坏人。

妇女界也出了几个大右派，妇代会上揭出了六员“女将”：浦熙修、丁玲、刘立明、谭惕吾、彭子冈、李健生。

这一切度说明，从去年开始的，会经一度缓和的阶级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又重新紧张起来。

在那个时期我们的朋友很忧心。美国人很高心，通知情报机关一天 24 小时都上班，昼夜不停地搜集情报，说中国要变了，意思就是说反革命要在中国复辟了。

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种情况是估计到了的。既然他们要搞，就索性大放大鸣，所有都登报，有意识地把一切牛鬼蛇神都摆出来，让全国人民看一看。知道 6 月 8 日，搞得太不像话了，匿名信也出来了，凡是说一点好话的，他们就恐吓；章伯钧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 6 教授开会，声言只能由他们收拾“残局”，等等。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快人心。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狠狠地反击右派。我们同右派之间的斗争，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不反击，风怎么能整得了呢？右派说我们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我们从来都说是毒草就要锄掉，他们进攻，我们当然就要反击、争斗，这怪不得

我们。

这场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并且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斗争，是两个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两个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我们同右派分子的矛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主席说，我们如果不进行反右派斗争，如果不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必须反击右派。不打倒他们，他们就会打倒我们，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去年我们只是在经济战线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胜利。右派的暴露，是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解决，没有决定胜负。在几百万知识分子中，有些我们党是没有领导权的，或者领导权不巩固。拥护共产党领导，他们举了手的，写上了宪法的，这次暴露了他们是假的。如果我们不反击右派，仅满足于从经济上改变所有制，是危险的；已经改变了的所有制，还可以变回去。

这场斗争，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有。主席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讲到，小平同志的报告也讲到了，农村中事实上还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哪能建设成功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还不巩固，还没有建设成，我们国家还未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了，但还没有近代化。农村中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外，还有富裕中农。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有半数左右是动摇摇的，还有少数是反对走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然对他们还是要团结，但是要改造他们。过去我们说农业合作化从根子上挖了资产阶级，这是就它的经济基础而言，思想方面是否解决了，不一定。有人说，粮食没有增产，农民生活没改善、农民苦、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统购统销搞糟了，等等，除了右派分子外，就是反映了部分富裕中农的思想。我那里有一个勤务员，是个好成份，父亲是被敌人杀害的，母亲是解放前饿死的。这个小孩子就是受了影响，说家乡遭灾，树皮都吃光了，农民苦等等。经过调查，根本不是事实，不仅未吃树皮，没吃树叶，而且粮食供应还如往年。他就是因为听了几个来北京作生意的富裕中农的话。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的意义，不能估计小了，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情。反右派能否彻底，6亿人民走不走社会主义，这在全世界是发生重大影响的。把右派打下去，把我们革命推向前一步。在这次斗争中，广大人民受到了教育，几百万知识分子会更好地团结起来，思想上得到提高、改造，把右派孤立起来，就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因为有苏联的经验提供我们学习，也可能要不了那么久。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内部不搞好，人民不团结好，不把右派彻底孤立，人民民主专政不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不巩固，那这一切就都会得不到的。

公安部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公安部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一共进行了4个月，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斗争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到今天，已经取

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垮了右派的进攻，驳倒了右派的谬论，广大机关干部在这场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第一是把右派驳倒了，即使不是全部博倒，有 80%驳倒了，也算是胜利，成绩是主要的。20 个骨干分子则是全部驳倒了。

第二是群众觉悟提高了。某些同志，开始分不清界限，分不清大是大非的，现在划清了界限。

反右派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孤立右派，驳倒右派，团结广大群众，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这次反右派，是健康的，如果在过去的运动中，如三反、二查还有些缺点错误，带来了些副作用，斗争面宽，或者比较粗暴，这次就不然了。我们坚持了摆事实、讲理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右派分子没有人格侮辱。很多同志为了讲道理，驳倒右派，还积极学习理论，找参考书，进行准备。就这一点讲，右派帮了忙，逼迫我们去看书，找武器，并且这样的学习非常深刻有意义，不会忘记，又不会犯教条主义。

我们的运动是正常的、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右派攻击我们说这是公式，现在我们还是要用这句话，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是真理，是事实。

现在我们机关内已经揭发出的右派分子 62 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2.6%）。其中骨干分子 20 名，一般右派分子 42 名。

在这些右派分子中，党、团员占的比例很大，90%是党、团员。党员 36 名，占右派分子数的 58.1%，占参加运动党员数的 2.3%。团员 21，占右派分子数的 33.9%，占参加运动团员数的 4.5%。非党、团员 5 名，占右派分子数的 8.1%，占参加运动非党、团员数的 3.82%。为什么党、团员多呢？因为中央公安部党、团员本来很多。当然党、团员大多数是好的。但是有右派。

在这些右派分子中，有 41 个是全国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占右派分子数的 66.1%；12 个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占 19.4%；9 个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占 14.5%。从他们所担任的行政职务看，处长 6 个，占右派分子数的 9.7%，科长 7 个，占 11.3%。科、处两级共占 21%。翻译、医生、技术员 8 个。科员、办事员 41 个，占 66.1%。因为这一部分人绝大多数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他们数量较大。

从文化程度看，右派分子中大学生占 32.3%；高中生占 35.5%；初中生占 27.4%；高小生占 4.3%。右派分子中，大学、高中文化的占 67.8%。大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他们文化比较高，知识比较多，是好处。但是有弱点，特别是现在大学生不少还是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同工人农民缺乏感情，缺乏斗争的锻炼，这是缺点。要有自觉，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知识高，了不起。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有知识的，但是有时知识分子可以变成最没有知识。如果他不锻炼，不接受改造，不参加到生产斗争中去，不同工人农民建立感情，

比起工人、农民来并没有知识。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更没有。因为他并没有进入阶级斗争，至多在学校里看了几本书，那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不仅现在如此，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好，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如此。当然，对大学生否定一切是错误的。大学生是我们的宝贵财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没有知识怎么行？可是另一方面，他们有弱点，这次右派进攻，他们的主要市场和阵地首先是五百万知识分子，这不是偶然的。林希翎是大学生。当然大学生绝大部分 90%以上还是好的，但是对弱点，要有警惕，不要自以为了不起。特别是刚出学校门的，更缺乏斗争的锻炼。就是解放后受社会教育的大学生，也没有锻炼。只有书本知识。解放前的就完全受的资本阶级教育，又是资产阶级地主的家庭，那些错误的反动的东西怎么不对这些人发生影响啊！右派，这是政治上的标准，不是按职务分的。科员、办事员中为什么多一点呢？因为这一层人就比较。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例如大多数人都是解放前后参加工作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就是没有改造、没有锻炼、又拒绝改造、拒绝锻炼，自以为了不起，就像前天（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老舍说刘绍棠，只21岁了几篇文章，一捧一吹，稿费一多，农村也不去了，勉强下乡还要带白馍，在北京买上房子，说美国好，其实美国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就是自以为了不起，说他是“神童”、“天才”、“才子”，脑子膨胀，天下第一，什么地方都安不下。老舍说，什么地方安不下，有一个地方安得下，就是右派的队伍中。同志们，老舍这句话是很深刻的。

当然，也有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这些所谓“老干部”、“老党员”绝大多数人都担负了处长和科长的领导职务。问题还是一个，有些青年知识分子拒绝改造，不参加实际斗争，有些老党员是在党内混了一、二十年，如果不改造，满身脏东西不洗掉，还是混不过去，会变成右派。例如叶天，他也有一、二十年党龄，既是右派，又是坏人。有个法国记者洛甘打了个电报出去，说胡风释放了，消息来源就是叶天。所以老的党员老而不正确，愈老愈坏。就这个意义上讲，倒是虚心的，接受改造的，受锻炼的青年好一点。老而不正确，背上包袱，就害了自己，因为他总有点资本，青年（这里讲的不是少数右派分子，是多数青年）这方面资本比较少，可能谦虚一点。

在大鸣大放时期，我们机关的右派分子，也会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社会上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应有尽有。他们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地进攻。

一是攻击镇反、肃反。我们专门干这个事，他就专门攻击这一点。右派分子就是要否定镇反和肃反的伟大成绩。他们的特点，就是在一系列早已明确解决了的问题上，大作翻案文章。特别是对1955年的镇反，一笔抹杀。对于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前夜阶段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一口咬定说那个时期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根本上否定第二次镇反的必要性。其人叫廉英。他们说二查镇反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

他们说第二次镇反运动是第一次镇反运动的“再版”和“遗害”，是“机械搬用了第一次镇反运动的经验”，因而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也是研究室的一个人，其人名廖贤金。他当面对我说：“如果我们错捕了5万人，5口之家，就有25万，3口之家，就有15万，家破人亡，你根本不痛心。”那有那么多家破人亡？没有那个事，错了我们都纠正了，有的今天晚上捉了，明天就放了。明天放了，就家破人亡了？至于馆陶县反革命把我们九口之家杀了7口，那样的家破人亡，他们看不到，反革命罪证展览会上多少家破人亡，他们是看不到的。他们不仅叫嚣1955年镇反错了，似乎连第一次镇反也错了。因为叫“遗害”吗！

他们认为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基本上是失败的，说这次会上制定的捕杀反革命分子的指标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天大的主观主义。七次公安，我们有错误，就是那时形势开始变化，没有看到，但是以后情况明显了，我们立刻就改了，没有按七次公安那样办。这样的错误，是普通性质的错误，这种错误那年也免不了。以后还可能发生。也有人批评我们“羞羞答答”，没有自我批评。什么羞羞答答？七次公安白纸上写了黑字，可以看的。把过程都摆出来，大家可以讨论。

他们认为内部肃反缺点、错误是严重的，否认成绩是主要的。这是谢光说的。谢光也是研究室的，其人已不在人世，他自己给自己作了结论。他是死右派，不甘心改造。历史上也有问题。这样的人，死了毫不可惜。对右派心不要那么软，因为对他们心软一点，他们就会反转来对人民心硬心狠。

他们还集中攻击公安部机关的肃反工作，说肃反是“杀鸡取蛋”（徐太雷），说公安部是“无反也肃，有错不纠”，并引而申之说是“公安部尚且如此，全国各地可想而知”（王伦堂）！诬蔑肃反是实行“宁可冤枉许多好人”的方针（王洪业）。他们与罗隆基提出的成立“平凡委员会”遥相呼应，提出要成立一个由一般干部组成的“肃反检查处理小组”，来检查肃反工作（黄文仲）。

二是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反对公安部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主张公安部门应当让民主人士实际上是让资产阶级右派参加进来。说公安部门没有民主党派就没有办法实行互相监督。吕超讲的。他们要把罗瑞卿反掉，希望黄绍竑来当部长，要右派分子王翔、王伦堂当领导人（邓鸿魁）。黄绍竑可吃得开哩！听说检察院的右派要求叫他党检察长，法院右派要他党副院长。黄绍竑当了公安部长还得了。黄绍竑到广东和特务谈话，猖狂地问：“你知不知道国民有个黄绍竑？我们都市一家人，我就是黄绍竑。班房里有什么不好的就讲。”他们都是一家人，和我们是两家人，这话说对了。右派分子还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共产党党组，认为有了党组就必然使得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杨昌裕）。说除“三害”的彻底办法是“连根砍掉”（邓友仪）。说“整风是为领导干部超度灵魂”（程涛）。骂公安部是“鲍鱼之肆”，骂不提意见的人臭的地方闻惯了，久而不闻其臭（王明迪）。有人说这是语病，我看这是骂得最恶毒的。骂公安部是“男盗女娼”（袁浩）。说“入了公安部，是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不得超生”（彭绍惠）。

三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民主集中制。他们否认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不如改造以前好，对国民党的失败感到惋惜（黄文仲）。说“社会主义来了，产品质量不好了，东来顺的涮羊肉也不好吃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审定”

（张友杰）。就是要否认我们革命是胜利的，建设是成功的，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好。请问几百万吨钢、长江大桥、长春汽车厂、制造飞机坦克也不好吗？东来顺涮羊肉就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仅用东来顺的涮羊肉来衡量？

他们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说粮食的增产数字是吹牛，不可靠，认为农业合作化搞快了，统购统销搞错了（廉英）。他们还说：“吃糠吃树皮，忘不了毛主席”（马场栓）。认为“历代封建王朝时代的农民都不像今天这样苦”（李睿毅）。

他们恶意地攻击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诬蔑我们国家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自由，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说我们国家农民限制过多，不能发挥个人见解（田颖真）。说我们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上边一阵风，下边不倒翁”（王伦堂）。

四是诬蔑党和政府的干部政策。他们诬蔑公安部的干部政策是一团糟，见不得人，是“任人唯资”。说公安部“上品无 50（大概指科处长以上没有在 1950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下品无 38（指 38 年）”（王明迪）。这个东西也值得攻？这是历史条件阶段的吗。

说老干部是凭资格吃饭，他们叫嚣要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邓友仪）。老干部仅凭资格吃饭当然不好，可是老资格也是可以吃一点饭的，主要的不是凭资格，但所谓资格就是参加过斗争。资格作为一个条件不是完全不可以的。诬蔑我们对知识分子是“利用、限制、改造。即是利用其技术，限制其发展，改造其积极性”（黄澄中）。他们诬蔑公安部对知识分子是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宗派成见（杨昌裕），是采取“蒙人治权的高压政策”（王翔），“好似奴隶主对待奴隶”（马允祯）。

五是攻击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他们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是等级统治着一切，说“有一个等级制度的怪影在公安部游荡着”（李金亚）。甚至恶毒地说领导干部子女也成了特殊阶级，说“领导干部的精子和卵子结合以后产生下来的孩子也就有阶级性了”（程涛）。

右派分子不仅大放上述的谬论，而且从大鸣大放的时期开始以至反右派斗争中，一直在积极进行活动，到处煽风点火，极尽拉拢、挑拨的能事（如王岱），有不少右派分子曾经鼓励他人向领导进攻。有的到处搜集向领导进攻的“材料”，甚至强制部长、局长的秘书公务员提供所谓“内幕资料”。有的并在幕后串通组织“合作社”。现在发现三个，一个是以马焕仁为首的反党小集团。他们由地下司令部，有作战部署，还有政治工作，鼓励情绪。这个人是老右派，历来不好。在司法部当整风小组长时就不反右派，利用职权把谭惕吾进攻我们的东西，通报出去。还有一个是以刘毅为首的反党文艺小组。还有以李金亚为大哥的所谓

右派“三兄弟”。

有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肆无忌惮地大放反动言论，抗拒斗争。徐太雷仿草木篇作了诗，“禽和畜”、“灵魂”及“无题”诗表露出他对反右派斗争和积极分子的极端仇恨。他的“忆荆轲”一首诗：“荆轲不复世。壮士今日有，若为自由故，捐躯何踟蹰”，更表达出他在政治上的极端反动，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企图向党和人民拼命复仇。黄文仲以睡大觉、酗酒、发脾气，摔打灯炮发洩他对反右派斗争的不满，当小组会上对他进行批评的时候，他的反动气焰很嚣张。同志们问：什么地方规定你有权利摔打灯炮？他答：什么地方规定我没有权力摔打灯炮？问：你究竟走哪条路？答：决定走死路。问：共产党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你？答：不能满足我想做统治人的人，像蒋介石那样……。许多右派分子，在斗争中坚持其反动立场，不肯低头认错，企图蒙混过关。有些在大鸣大放时暴露不太明显的右派分子，则极欲缩回，等待时机再来。至于右派骨干分子谢光则以可耻的自杀抗拒到底。

这些情况说明，我们中央公安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机关，出现这样一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内应，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现象。我们的公安机关，是党和人民的战斗堡垒，而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夺取的，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内应混在我们的内部，有些还是在我们的机要的重要岗位，这难道不是十分危险的吗？譬如我们的研究室，是我们的参谋性的机构，只有十来个人，就有谢光、廉英、廖贤金三个右派。谢光是研究室实际的领导人，党在研究室就变成没有领导权。又如一局是很重要的侦查部门，也有吕起超、杨昌裕这样仇视共产党、仇视共产党领导的右派分子。他们几年来直接参予镇反运动和对特务间谍分子的斗争，在资产阶级右派攻击诬蔑镇反肃反的时候，他们不挺身出来回击敌人，反而起来响应敌人的进攻，成为敌人的内应。这是多么严重！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内部的右派分子，不是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右派更加危险更加可恶吗？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公安部的反右派斗争，除了一般意义外。也就具有更加重要的特殊意义。当然，右派不反掉，在那里都不好。但是在我们这儿就更危险。所以公安部反右派反的愈彻底愈好。

根本问题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改造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我们公安部机关内会出现这些右派分子呢？是不是很奇怪呢？当然看起来一点儿奇怪，但是把问题看穿了，也并不奇怪。我们来看看揭露处理的62名右派分子的情况，就可以明白。

一、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是本人的亲属被镇压、被管制、被斗争，因而对党怀有很大仇恨的，有24人，占38.7%。

二、本人历史不清楚，社会关系复杂，在肃反中被斗争，或在肃反、审干中被审查，或因犯过严重错误而受到组织处分，因而对党不满的，有13人，占20.9%。

三、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因而对党不满以至

仇恨，发展到思想蜕化变质的，有 25 让人，占 40.3%

这就说明了，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右派分子中有些所谓“老党员”、“老干部”，沾染了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名利地位享受，骄傲自满，不愿接受党的教育和群众的监督，因此蜕化变质，有一个曾经是无产阶级的战士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走卒、资产阶级的右派。这些“老干部”，他们曾经同党走过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走好没有走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总算过来了，现在却不能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了。他们不仅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发生根本的分歧，甚至公开反党，同党处于完全敌对的位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凡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个人主义的人都是右派呢？有这个弱点的人，可能变成右派。关键在于自己的立场。接不接受改造，对工人农民有没有感情，愿不愿意为工人、农民服务。知识分子的队伍在反右派斗争，有一部分叫左派，立场问题解决了；有一部分叫右派，在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大部分叫中间派，立场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右派一进攻，乌云笼罩的时候，动动摇摇，就受影响，犯错误。右派为什么猖狂？就是右派的很多反动言行，有人支持，有市场，即中间派。我们同右派的斗争，主要的是争取中间派。我这里不是讲我们很多同志是中间派，但反右派斗争对我们都有教训，我们公安部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主要的收获是打垮了右派；锻炼了群众；取得了教训。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绝大部分同志表现是好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有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受了影响，立场不坚定，动动摇摇，分不清大是大非，看不到右派的阴谋。不管是动摇过的，或者没有动摇过的，态度明朗的，维护党的利益的同志，都应想一想，从中得到教训。作为公安干部，不论党员、团员、非党非团，仅有爱国主义立场，人们立场，是不够的，还要有阶级立场，就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爱不爱国？当然爱国。但仅有爱国主义立场就不一定有无产阶级立场。人民之中还有阶级。今天除资产阶级右派以外，还有资产阶级的另外一部分也是人民。他们同无产阶级有矛盾，一般地说人民内部矛盾。所谓立场，就是讲要有无产阶级立场。党员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青年团员也要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因为他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如有风吹草动，还会动动摇摇，这也就是政治。我们很多同志不大注意政治，没有政治就是没有灵魂。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反右派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带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阶级斗争。而我們有很多青年同志是好同志，可是风浪一来，就站不稳立场。总而言之，解放八年来，经过三大改造五大运动，已经有了教训，但就是不接受。在王明迪那篇反动文章上签名的大部分是好同志，但为什么有人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漏了还要求补上呢？觉得没有她的名字似乎不光荣，这样的同志就要很好想一想究竟立场、感情怎么样？这次反右派就是打防疫针，政治上抵抗力总应强一点。立场要坚定就要锻炼，没有锻炼，立场就坚定不起来。刘绍棠 21 岁，完全是我们培养起来的，他现在是右派，忘恩负义，共产党的好处全部忘记了，没有共产党哪有刘绍棠？可是他居然反共。那对我们来讲是一面镜子。田颖真本

来是贫农，经土改后成为中农，他就忘本了。同志们啊！我们这些人不是大知识分子也算小知识分子，你说出身我也是地主，开始参加革命时立场就那么坚定？也不那么坚定。社会关系也不那么简单，也有几个地主、富农的亲戚朋友。总理也常讲他的社会关系很复杂，台湾就有他的亲戚。所以根本性的东西是自己。讲立场我们这些人谁有总理坚定？讲家里有什么人受过斗争和镇压，总理就讲他有一个亲戚还在劳改。邓小平同志在清华大学公开讲他家里就有亲戚被镇压。所以问题决定于态度，立场。是跟无产阶级走，还是跟资产阶级走。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要背叛原来的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是又投降、又不想投降，或者假投降，这就不行。要真正、彻底地投降，这就叫锻炼。我们加入党，也是革命浪潮卷进来的，当然也有一点主观原因，对旧社会不满。但那时一脑子糊涂思想，不过比你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了斗争，在很严重的战争环境里经过了斗争，受到了锻炼。现在是和平环境，比较差一点，但锻炼也不一定非要战争不可，这次反右派斗争就算很好一次锻炼。要到斗争去锻炼，到群众那里去锻炼，要劳动中去锻炼，要建立工农感情，要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是自然的，不是勉强的；要懂得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虽然文化不高，也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它是最有希望的阶级。它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却有别的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他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主席在三中全会上讲我们这些人也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为什么？因为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个阶级的光明远大前途，看出社会发展规律。搞清楚这些，要带自觉性，要同工农搞在一起，心要通，要站进去，真正看到他们有什么好处。要锻炼，就要采取谦逊的态度，不要以为读了几本书就了不起。读几本书是容易的事情，真要使自己提高觉悟，立场坚定，为无产阶级服务是不容易的，要真正的经得起锻炼、考验。

工农出身的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要很好团结起来

公安部就有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干部，斗争历史较长；有一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斗争锻炼比较不同。这两个部分要很好团结起来。这也是对工农感情的问题，也是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对老干部要有感情，不是对他们的毛病要有感情，不是要跟叶天那样的老干部建立感情，我只讲对一般老干部。在高难本这方面是有问题的。对老干部就有人轻视他、鄙视他、仇视他。他们毛病虽然有，个别人可能还很多，但他们不是右派，是忠心耿耿为党为社会主义的。对右派有时还发生一点感情，而对老干部就格格不入，甚至仇视，这既是感情问题，也是立场问题。老干部有缺点应批评，但应从团结出发，从爱护出发，帮助他们改正，要全面看，他们有经验，受过斗争锻炼，受过考验，有艰苦奋斗传统。轻视他、鄙视他、仇视他有什么道理？他们有好处要学过来，不学总是损失。这样就可以团结。当然老干部对青年干部也有的瞧不起，总是看他们的缺点，对他们不是热心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这也没道理。对青年同志应热心帮助爱护，所有的同志都要有这个自觉，不仅要替我们这一代打算，还要替下一代打算。青年人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接班人。如果关系搞不好，老干部要多负

一点责任。双方都要有主动性，青年不要光看老干部的缺点，可能老干部是有缺点的，但是缺点可能是比较少的，当然老干部的缺点更不应该原谅。经过反右派斗争后，要更好地团结起来，互相学习，老干部要向青年干部学点东西，青年更应该在老干部身上学点东西。右派丑化老干部，那我们反对，但也有少数同志脑子里总不是那么服气，总觉得这些人不称职，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当然有少数不称职的，不能因为少数就作结论老干部都是不好的，都是落后的，他们的时代过去了，历史使命完成了，现在应该让位。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相反地应在他们身上学点东西，因他们经验比较完全，立场比较坚定，他们对是非比较明确。同样老干部对青年干部只有爱护、帮助的义务，没有讨厌排斥他们的权力。如果这样，他也是宗派主义。在这一方面，要更多的要求老干部，责备老干部。关系不好，首先责任在于老干部，因为他们一般都处于领导地位。

青年干部要相信人民，要同工农建立感情

青年干部还要同工农建立感情，比如参加体力劳动，多接近他们一些，只是一种办法，还有更多的办法。要相信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是最有希望的，他们身上毛病比较少，他们对是非的辨别能力比我们高明。许多农民虽然对我们党的工作或者党的某些组织有意见，对政府的某些工作、对某些干部有意见，但是大是大非分得清楚，右派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不答应。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工人农民首先反对。知识分子要上街闹事，首先反对的是工人、农民，并不是青年知识分子。师范大学一个右派上街贴大字报，首先反对的是三轮工人，他说：“不准你贴，贴就揍你！”南京大学学生到新华日报闹事，首先反对的是老干部、工人、农民和市民群众。一个老太婆打了她的闹事的儿子耳光，老太婆骂他：“忘本、共产党要你读书，你还闹事，混蛋！”为什么老太婆比儿子高明，老太婆是个劳动人民。还有一部分听说是军事学院的学生，那是老干部了。也要上街反右派，好多人身上有好多枪眼，学校里说上街不好，你是穿着人民解放军的衣服，人家学生闹点事你就去，怎么行哩！他们说：“那就找便衣啊！”当然，最后还是劝说他们不要去。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学生闹事后，上电车要把学校证章摘下来，因为劳动人民看到就知道他们是在街上贴大字报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些同志名曰干部、知识分子，却分不清大是大非，而农民知识很少，甚至还有文盲，工人也没有那么多知识，他们就是分得清大是大非。我们乡村干部作风不那么好，老百姓对他们有很多意见，但你让他们下台不行。汉阳中学生闹事，几千个农民拿着扁担要打，党委做了很多工作，才把他们劝回去了。南京有一些学生包围一个解放军军官的宿舍，说他腐化了。一批建筑工人同他们讲理，说解放军将军的薪水是按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拿的，你们将来做了将军也可以多拿一点，他们说人家不吃苦，你们吃苦啊？南京大学的漂亮房子是谁修的？是我们修的。要吃苦，同我们来比赛，看谁吃苦！几个右派，就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跑掉了。这一些很值得我们每个青年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应该从这些事实里面吸取教训。正确地认识和接受这次斗

争中的教训，坚定立场，提高思想，提高觉悟。

要又红又专

讲到政治、立场问题，毛主席在三中全会上，好找我们广大干部要“又红又专”。就是说我们的党要有一个广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老干部也好，青年干部也好，要下决心振作起来，要下苦功夫，好好学习，使我们在若干年内，譬如说十年，变成一个“又红又专”的干部。红者就是讲政治，专者就是讲业务。有些同志向科学进军，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有些片面，只学业务不学政治，口号就是“先专后红”，“红不红不要紧”“先变”成专家，然后再染颜色“。这是错误的。离开政治的专家是没有用处的，是我们不需要的。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说老干部凭老资格吃饭，不要因人废话，值得注意。老干部红是有一点，就是不专。光靠红还不行，红是要紧的，是第一位，但是还要专。青年干部现在也还没有专，专的方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红，就是要讲政治，没有政治，就没有灵魂。光专不红，是不好的，就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专家而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中国现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专家。现在我们要改造，要加强政治，就是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又红又专”的专家，“又红又专”的干部。青年同志首先要注意政治，注意立场。讲政治就不能讲半红色、粉红色、灰色不好，白色就更不好，要是大红的，五星红旗那样红。总之就是要立场坚定、政治觉悟很高，专一门业务，学一门本事，为政治服务。老干部受过锻炼受过考验，今天有许多事情我们熟悉的，都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事情强迫我们去做。老干部红是有一点，就是不专，过去不是有人叫“万金油”已不能解决问题了，这一点很要注意。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呢？没有。说是主席讲的要下苦功夫，振作起来学习。可是现在有少数干部，学习没兴趣，就是觉得自己有一点红好像就够了，实际是不行的。

关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对右派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这里有 62 个右派，怎么处理？全国有这么多右派，比如有部长、有局长、有司长还有主任、有处长、有科长、有院长、有校长。总而言之长字号还有相当多呢！比如罗隆基、章伯钧是不是照样当部长？我们这里的处、科长是不是照样当处长、当科长？还有我们这里大部分是党员、团员，是不是还照样当党员、青年团员？今天报纸上小平同志的报告已经宣布了，听说右派看到很着急，着急也没办法，怪谁呢？现在谁也救不了谁，上帝也救不了，只怪你自己当右派。共产党员总不好当了吧？因为你共产党员要反共，很不好吧！共产党里还能有几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在青年团里是不是可以？青年团总还是革命团、左派团，是真正革命的吧！哭也好，什么也好，恐怕党籍是没办法了，因为党籍是不好送人情的，共产党员反共是不许可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右派成了章伯钧的助手，怎么能在我们的青年团里，那怎么办呢？要不要捉起来，受刑事处分，杀头、枪毙，那还倒不会，一般右派不会，恐怕就是右派骨干也不会。刑事处分，除非是有革命活动。右派也是反革命派，也是反革命性质的活动，就是要搞阴谋，

像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搞法。右派本来是要搞颠覆，要推翻我们，要复辟了。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把他们列为那样的反革命活动，所以刑事处分不给。当然也不能说死了，我们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法院，大体上不给。党籍要开除，团籍要开除，有些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分还有不有？你们都可以考虑一下，我只是提出问题。不过这一点总可以说清楚，只要他们真正低头，真正认罪，愿意改造自己，不在搞破坏活动，不搞特务。“夏季形势”上面已经讲了还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还有一点就是给饭吃，给他们一定的工作。邓小平同志报告上只讲了党内外右派一视同仁，共产党员要开除党籍，共青团员要开除团籍。小平同志报告上还讲了机要部门，我们这里算不算机要部门，机要部门里可不可以允许有右派？对于右派分子是刑事处分，还是行政处分？是纪律处分，还是不给处分？是开除，还是不开除？是原职原薪，还是另行分配工作，是劳动改造，还是劳动教养？党里面是已经定了，因为三中全会讨论过了，我们这里有没有反对，说右派分子的党籍不应该开除，应该保留？假如有这种意见，也可以拿出来讨论。大概不会有了吧？

整风运动的当前任务

整风运动已经走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大鸣大放，第二阶段叫做反右派斗争。按三中全会说，一般机关、学校的整风运动要经过四个阶段：大鸣大放；反右派；整改阶段，就是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个人提高的阶段，每个人要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批评自我批评，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公安部的整风运动，在现在情况之下，应该由反右派斗争阶段转到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主的第三阶段。这就是我们公安部整风运动的当前任务。小平同志讲了八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改进工作，争取全胜。整风运动仅仅把右派反掉而不改进工作、整顿作风，这不叫全胜。右派也反掉了，工作也改进了，作风也整顿了，这才叫全胜。大鸣大放也好，反右派也好，整改也好，每个人都要受到教育，不是孤立的，不是分离的。所以公安部要转到第三阶段，在不转就不好了。中央讲要适时的转，右派没反好就转，叫早了，反的差不多了，还不转，就叫做迟了。我们的反右派斗争经党组讨论，80%低头认罪了，骨干分子全部打倒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划清了界限，这就是可以转到第三阶段的标准，是适时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转。

整改斗争的主要锋芒就是三个主义，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如果说前一阶段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右派，是敌我斗争，敌我矛盾，阶级斗争，那么第三阶段就是要搞三个主义，是属于内部的问题。三个主义的账，也应该挂在资产阶级身上，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要在无产阶级队伍里面整呢？就是无产阶级队伍受影响，受它的侵蚀，所以我们现在用整风的办法，把这些东西整掉，消毒。前段大鸣大放的时候，大家对三个主义进行了很多批评，提出了很多改进工作的意见，一共有2470条意见。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好的，有些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

也比较偏激，只要不是右派，就是不正确，比较偏激，有些还比较挖苦，那也不要紧，对改进工作也有益处。大家揭发的问题比我们知道的多，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几年以来，公安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几年来虽然对这些东西做过一些斗争，克服了一些，但还不够，新的东西有生长起来了。对我们来说，右派不反很危险。三大主义不克服就使我们的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我们的党就要官僚化，社会主义也是搞不成的。我们说共产党不会亡，不是讲三大主义不克服也不会亡，说共产党不会亡就是他对错误、缺点能及时地揭发，及时地改正。当然共产党从根本上就有这种可能，即揭发和克服自己的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同别的资本主义的政党的原则区别。

公安部比较突出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这个现象很严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部长、副部长这一层，同群众的接触太少，太不够，群众心里想的什么，讨厌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有什么要求，思想状况怎么样，学习、工作和生活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不甚了解的，是有隔阂的。而且有些领导干部，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有事不同群众商量，有时候态度还很坏；有些领导干部官僚架子很大，群众接近不了。动不动就训人，非常武断，群众总是不对的，自己又不亲自动手。许多事情不动手，自动口，动口也很简单，有不动脑子。有人批评我架子也很大。是不是也有点架子？就是很值得我注意。此外有些领导同志不民主，没有民主的习惯，就是你要听我们，我不能听你的，我说了算，对待自己的部属不是平等对待，同志相处，而是界限非常之严。如在这里听报告、看戏、开晚会就分等级，脱离群众，特殊化。当然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小事了。主要的是领导和群众团结起来，大家心通，亲密无间，有事情就敢讲，就如同“夏季形势”里面讲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的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活活泼，亲密无间，没有什么隔阂，领导同群众打成一片。是两条心？那也不是。大家都是革命的心，是共产党的心，社会主义的心。但毕竟这也是个大原则。怎么样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样把社会主义搞好，怎么把公安部的工作搞好，大家都负起责任来，把所有的智慧都集中起来。那还得做很大努力。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就是领导上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领导干部不大关心、不够爱护青年同志，不懂得他们身上也还有很多长处，群众才能创造一切，个人作用小的很。要把公安工作搞好，要靠公安部的所以同志的努力。有些领导干部有毛病不自觉，有些自觉了也不改正，有些自己还不晓得，可是大家看得很清楚。

第二，机构制度的问题还很多，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有些原来好的，现在不对了；有些应该改的，也没有改；有些是由于过去没经验，是在摸索过程中，怪不得，但现在比较有经验了，就是守旧，舍不得。机构重迭，人浮于事，公文旅行，工作效率很低，分工不恰当。在体制方面，那些归公安部管，那些归

下面公安厅、局管。问题很多，混乱，甚至有矛盾。文件今天一个这样讲，过几天又出一个那样讲，前后矛盾。公文旅行，办事拖沓，很简单的事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拖几个月，有的干脆忘记了，不处理。工作组织得不好，有许多同志很忙，有许多同志很闲。闲的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本来就是没事情，一个就是有些同志孤立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家。人的积极性没有组织起来，发挥起来。

第三，思想工作薄弱，干部工作问题很多。许多领导干部常常鑽到事务圈子里头，在文件堆里过活。至于干部思想就抓的很少，不晓得干部思想如果不搞强，思想阵地不巩固，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要去占领。不懂得这些道理，或者不完全懂得或者懂得不深刻。干部工作有很多问题。有一些人受了资产阶级影响，蜕化变质了，有些阶级异己分子在这里散布他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察觉。我们的政治机关做了很多工作，这次右派攻击特点之一，就是攻击政治机关。那我们坚决反对。但是政治机关的思想工作、干部工作是由很多毛病和缺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点，不改无论如何是不好的。而思想工作不仅是政治机关的事情，是所有干部的事，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事，光靠政治机关也是不够的。党组管的够不够，是不是认真，也值得考虑。

编制方面还有问题，今天看起来，过去是有盲目性的，过去想法不妥当，不合乎实际，下面干部调中央来的，太多了，以致一些干部长期不能分配工作。对青年干部一般事帮助不够的。当然一个人的进步主义事靠自己，但外力帮助也是很重要的，没给他们想些办法，造成一些条件，使他们得到锻炼。这样，对少数不坚定的青年干部就害了他们，长期呆在领导机关里，骄傲自满，自以为了不起。

第四，机关行政工作、生活福利，过去有许多问题和缺点，差不多每次党代表大会、团代表大会都有很多意见。广大群众生活问题，有些应该解决，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有些不公平。比如福利费，应该领的照顾不够，不该领的就领了，还受了坏人的骗，拿福利费买三轮车，叫他们的外祖父上午蹬三轮，下午出租。什么地方批准的？这么不合理啊！你们可以揭发，大家起来讲就有效果。过去公安医院对有些干部进行了揭发，虽然有些揭发不妥当，有夸大之处，但不完全夸大。总之，这方面就是特殊化，不是简单多领几个福利费，而是脱离群众，不名誉。有些人孩子多，家庭负担大，应该照顾。但是孩子多就要吃一点苦，谁叫你那么多呢？不能照顾的太好。我也是一个犯错误的。孩子多又没觉悟，犯了错误就要有觉悟，不要再犯了。我们不是已经六亿人口吗？少增加一点吧！此外还要勤俭持家，艰苦奋斗，量体裁衣，刻苦一点。但总是既不觉悟，也不勤俭持家，又不想办法，就是伸手向国家要，而且要的不合理，这就不好。

在上次鸣放中提出 2400 多条意见，但绝不止 2400 多条，可能事几千条，一万条，几万条，十万条。因为那时很快地就转入反右派斗争了。就是已经提的 2400 多条，因忙于反右派也只是改了一点，而且都是属于事务性的，如生活福利、生活制度、房子问题、食堂，等等。所以，许多应该改进的还来不及改。

现在已经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对整改创造了有利条件。

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

为了有系统地进行整改，专门搞了一个阶段，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们应该坚决地执行党的决定。所以我们要继续大鸣大放，口号就是：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改，为此就要必须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改。

但是，有很多同志不了解为什么又要大鸣大放？过去大鸣大放本来是要去掉三个主义，结果放来放去放出右派。那也很好，我们就反右派。如果不反右派政治方向不能端正，思想水平不能提高，广大干部不能团结，当然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现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得到决定性胜利，所以要继续整风，大鸣大放。

因此在第三阶段，就要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就是鸣放的高潮，整顿工作，改进作风的高潮。怎样搞鸣放？还要不要反右派？这个阶段主义三个主义，右派没有反好的还要继续反。第三阶段着重事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着重批评领导的三个主义。对公安工作来讲，现在摆到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把工作做好一点，还是做差一点，对党的任务事完成的好一点，还是差一点？我们是促进部还是促退部？如果不是要把事情搞坏，而要把事情搞好，那么，大家就要把三个主义搞掉，不反掉就很可能变成促退部，促退公安工作。如果这样，对谁有利。谁高兴，就用不着解释了。所以要求大家对于公安部的各项领导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特别事部、局、处三级领导干部，其中特别事部领导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揭发和批评，并提出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改进作风的各项建议。

这次鸣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从方针政策上一直到具体工作上的问题，从部长、副部长一直到每个同志，特别事领导干部，都可以批评提意见。根据我们的情况在第三阶段，可以着重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第二机构制度问题，第三干部工作问题，第四生活福利问题。首先从那个问题起，看情况恐怕事领导与群众关系，机构制度问题比较多一点，首先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其次干部工作、福利工作、党的工作、团的工作、行政的工作等等。形式可以各种各样，可以小组会、座谈会、辩论会、写信、谈话、所谓小字报——“整风动态”继续出，凡好文章都登，根据情况几天出一期，一天出一期，一天出两期。还有最重要的是大字报，作为主要形式。听说有些人对大字报不感兴趣不懂得它的好处，我过去也不太懂得。第二阶段缺点就是没出大字报，只出了几张。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报告中讲，要把大字报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常形式。毛主席关于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这是今天革命斗争最好的一种形式，群众创造的，为我们所寻找的，今天找到了，这是最广泛的、最民主的群众路线。大字报明朗、活泼、直接、公开。顽固的官僚主义者，别的不怕，就怕贴大字报，如果一张不行，两张，一直到一万张，主席将要传下去。我们党缺点虽很多，但有民主传统，敢于接受这种形式。我们还通知资本主义使馆的人去看大字报。外国也看出来了，说中国共产党这样办，并不表示不得了，相反表现巩固、坚强。现在大字报意见具有世界意义了。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叫“大字报万岁”。文章中

引工人一段话歌颂大字报：

“大字报，大字报，你的好处真不少，以前要是提意见，只有少数人知道，要给领导提意见，可能几天没传到；整风有了大字报，批评马上就知道。意见不论大和小，公开批评不客套，帮助整风大字报，你的功劳真不小。”我们在第三阶段，大字报可以自由出。个人出，小组出，党团出，一般干部出，领导干部出；可以对人，可以对事，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可以辩论，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自我批评，可以反批评，可以建议，可以提方案。总之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群众路线的优越性，使正义的火烧起来。今天开会也就是要放一把火烧三个主义。大字报不写名字可不可以？可以。我们不提倡这样，但有些同志有顾虑，那有什么办法呢？签名可以，不签名也可以，真名可以，假名也可以，没有限制。还有范围就是在公安部里贴。还有一点就是上次已经讲了的，工作的秘密不要贴大字报，主要是对敌斗争不利，涉及这方面的意见可以写信，可以找党组、直接领导或有关人谈，小字报——“整风动态”也不登。此外，还有一个建议，不算限制。就是属于一般性的男女关系不要贴的大字报，不然就可能冲淡了政治意义，可能把斗争引向不正确的方向不健康、甚至庸俗的方向。对于这种问题并不是容忍，而要用别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很严重的特殊的很恶劣的如打老婆，侮辱妇女，欺骗，违背婚姻法等，我主张贴，不管他是什么人。一个党员、革命干部，道德堕落的不像话，就是要公布与众，用群众力量逼迫他改正过来。

此外，提意见可不可以尖锐？可不可以讽刺？越尖锐越好，也可以讽刺。可不可以丑化？如果事从团结愿望出发，就不要筹划。尖锐，讽刺也不等于丑化。尖锐了会不会片面？可能片面。因为大字报明朗、直接、公开，不可能像写文章那样的写法，大字报只讲缺点，并没讲你没成绩、优点。如果 100 条意见有一条正确就好，如果 50% 正确就呱呱叫，一条都不正确，也没什么坏处。因为意思是好的，只是情况没搞清楚，对问题见解不对，有误会，不能怪。不同于右派，右派事造谣，他们要打倒我们，要复辟。至于自己的同志，就可以容忍能不能鸣放得起来？应该鸣得起来。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错误，暴露咋爱群众面前。主观上经过反右派斗争，大家觉悟提高了，对三个主义更加不能容忍。再就是我们党、团员很多，对反对三个主义应该带头。所以就应该能鸣放得起来。但是可能有顾虑，来自两方面：一方面领导干部有顾虑；另一方面事一般同志也有顾虑。所以这里又发生一个敢不敢鸣放。敢不敢大辩论，敢不敢搞大字报的问题。对前一次的大鸣大放。就有的同志不敢，怕乱了。中央说不会搞乱，越大鸣大放越不会乱，出点小乱子。避免大乱子。现在证明中央是对了。现在又发生敢不敢的问题。毛主席的指示，小平同志的报告都讲到大胆地放、大胆地改，这就是要敢。

领导干部不要怕，要相信群众的多数，也要相信自己

领导同志有顾虑，也可以理解。因为反三个主义，不是反王明迪，也不是反王伦堂、李仲秀，而是反我们这些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放火烧谁？烧我们这些

领导人，火是好火，烧不坏，越烧越健康，不害病了。孙猴子为什么厉害？就是收了锻炼的，就是老君炼丹把他装到炼丹炉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所以各方面都很坚强。同唐僧取经，妖怪打他不赢。我们的大字报比老君炉还好一点。这样好事害怕什么？把毛病保留起来好，还是烧掉好？所以不要有顾虑。领导同志怕伤面子，犯了错误面子就不那么好看。现在一张大字报就能解决问题，保留起来，将来要上千张，会伤大面子。怕丧失威信，也不对。有了错误，大字报帮你的忙，改正错误，威信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更加高还是更加低呢？把错误保留起来有威信，还是改正以后更有威信？怕丧失面子、威信，都没理由。还有的想把缺点，错误隐藏起来，我自己改就行了，何必还贴大字报的？有错误怎么能隐瞒住的？隐瞒不是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抵抗，就是不接受，你批评我，我就反批评，你贴一张我就贴两张。那也不是个办法。大家都有眼睛，谁是谁非大家看得很清楚。从前我们就劝过同志们，不要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要发表宣言，不是老虎的屁股，要叫人家摸。共产党连帝国主义都不怕，你那老虎的屁股就那么怕？所以，领导同志有这些顾虑是没有道理。至于怕垮台，一般地说垮不了，相信自己就是指的这个。所以也不要怕。如果很严重的话，要垮就垮，垮了也许还会爬起来。俗语说“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爬的起来就爬起，爬不起来你再爬”。如果你不承认错误，不叫人家大鸣大放，不叫人家贴大字报，你那个台就不垮了？恐怕垮得更厉害一点，可能永远也爬不起来。如果你的那个台已经有点动摇的话，那么，经过大鸣大放，大家帮忙改正了错误，可能会巩固起来。过去黄河铁桥动动摇摇，早就说过了期了，苏联专家建议“加固”，现在听说还可以用许多年。我们有些同志的错误缺点比较严重，实际上已经和黄河铁桥差不多了，动动摇摇，想个什么办法那呢？办法就是整风，大鸣大放，走群众路线，让大家帮助你把错误缺点改正，那就可以“加固”了。所以，这是天大的好事，一定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般干部要打破“四怕”抛掉“三个借口”

至于一般的同志据说有四怕。第一，就是怕大鸣大放，放的不对将来当成右派整怎么办？这个顾虑，应该打破。右派是由规格的，就是毛主席说的六条标准。不能因讲几句错话就成了右派。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不会违背这六条标准，有时违背一点，也并没有破坏这个标准，不能算右派。或许有人说，你现在又讲，一个人出大字报也好，几个人出也好，商量也好，尖锐也好，讽刺也好。上一次大鸣大放动员时你也讲这一套，结果讲了以后就搞右派，将来是不是还反右派？这次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根本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同志们！上一次我们也是想整风，结果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有什么办法？如果他是合乎六条标准，不是右派，那么我们的话就是灵的。比如说，在整风的范畴里一定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准不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有右派为什么不实行这个原则呢？因为他是右派，是敌人，他要言者无罪那怎么行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罪，至于“闻者足戒”“有则改之”当然更不行。右派要我们改掉共产党的领导，改动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改不改呢？

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是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的，所以这一点用不着怕。如果自己首先上有些错误暴露出来，没有什么坏处，在第四阶段进行检查加以解决就行了。错误装在脑子里，还不如放在太阳底下，公布给大家看看，也是个锻炼么！但这与右派不同，不能混淆起来。而且已经有事实证明，上次鸣放中有些同志提意见并不那么正确，时错误的，偏激的，片面的，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些甚至是受右派影响的，也不完全是善意的。对那样的人，我们是不能把他当作右派的因为他仅仅是提的意见有错误。为了说明问题起见，我来举一点例子。有一个黄金灿同志，我还和他谈过一次话，他的文章刊载在“整风动态”上面，以后有人批评他，他也做了一些检讨，他在反右派，应该说是我们队伍里的人，好同志，可是他第一篇文章（在党组座谈会那篇文章）是有严重错误的，你们可以翻开来看。他那些话是很不好听的话，很错误的话黄金灿不是右派，他那些言论也不能是右派言论。有一些他有检讨，有一些还没有检讨。我建议黄金灿同志在第四阶段检查一下，提高一下自己，得到教训。而且在第三阶段有些意见还可以提，大鸣大放，贴大字报。还有一个杜文荣同志，提出所谓干部政策的“四个原则”，现在也没有划为右派，那篇东西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同志，对领导干部提了很偏激的意见，甚至是夸张了的，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划成右派。还有公安学院对一个什么人，争论不休，有些人说这个人一定是右派，我们说不仅不是右派，有些意见还是好的。此外，在对镇反、肃反、干部政策和对领导等问题上，都有错误的议论，偏激的意见，甚至于有少数的个别的动机都是不纯的，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划为右派，因为他们不是右派，他们是带着缺点或者错误的好同志。所以已经有事实证明，这点顾虑是不应该有的。尖锐也好，讽刺也好，只要不是恶意的，包括某些动机不纯，有错误也是属于一些犯错误性质，假使什么人利用反右派把这样的同志化成右派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怕打击报复。打击报复也可能有，怕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第一不怕，第二也不可怕。一个人又不正确的想法，他就打击人家，报复人家，但他是不合法的；不仅不合党法，也不合宪法，国务院宣布的关于奖惩条例，也不准打击报复。所以这种不合法的东西，不要害怕。至于整风反右派以来有没有打击报复，据李仲秀说打击报复是多样式的，性质证明完全是加地，有些事造谣，并且当面造谣。他说周付部长长着八字胡、肚子大大的等等。周兴付部长什么时候流过八字胡？他为了丑化就这样造谣。还说什么所有的人都哭啦！如果有，大家可以贴大字报，有被打击报复的可以申诉，别人可以打抱不平，可以检举，一直告到中央去。搞打击报复的，不管什么人，不管他的位子多高，坚决反对，而且要处分。人家提了意见，就给“穿小鞋”，这样的人总是要垮台的，所以这个也不要怕。

第三，怕提了不改。这是个老意见了。这回事下了决心，因为党中央毛主席都下了决心，一定要改。不改，就逼迫他改，可以贴一万张大字报。所以这一点也不要怕。过去一段我们改得不多，但也改了一点，这也表现了决心。现在采

取一些措施，专门来搞整改，意见成立了一个小组，由王金祥同志负责。将来要多成立几个小组，首先对 2400 多条意见要向大家交待，那些改了，那些准备改，那些不能改，也要说明白。各局也要这样办，每一件都要有交待。

第四，怕领导不信任。这点我想也有点道理，但是也可以不必。一般地讲真正的领导事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情的。领导应该事公平的，对于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干部、国家机关干部，对纠正错误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虽然意见还不够正确，也就更应该信任。对唯唯诺诺的人的信任可以差一点。从整风运动一直到现在，也有个别的同志好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发表意见，不表示态度，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样的同志怎么能取得信任？至于有那么些领导，就是喜欢他讲什么，别人就讲什么，对唯唯诺诺的叫做听话，对意见多一点叫做不听话。这不是好领导，是坏领导。不能讲我们领导人中没有这样的人。对于这种坏领导不要他信任也可以，对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干部来说，只要取得党的信任，人民的信任，就是最大的安慰，不要去迎合那种坏的领导的信任。迎合坏领导叫相信，那就是自己犯了错误。

除了四怕还有三个借口，第一叫做多考虑少发言，第二叫多建议少批评，第二叫多拥护少反对。这也可谓之“考虑周到”。这样的人是学了章乃器的方法，章乃器据说就提倡 3 过对国民党蒋介石要“多建议少号召”，“多拥护少反对”。我们的同志的这些所谓周到考虑在性质上情况上当然和章乃器不同了，但是这些同志也化了一些心思。多考虑一下是可以的，不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要老于世故，老奸巨猾，那就不是多考虑了。人生半百，也还不算老，“人到 55，才是出山虎”，老虎没出山还不算老，青年同志就那么老于世故，老奸巨猾？少发言不好，要多发言，多建议是对的，少批评不对。建议要有，批评也要有，凡是应该批评的就批评，不应该少，不应该批评的你批评了，那就是多了，应该批评的你不批评，那不对。多拥护少反对，这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多拥护”做错了你也拥护，就没有是非了，没有原则了。应该拥护正确的，凡是错误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坚决反对。还有一怕，批评领导是不是打击了他们的威信呢？如果有这种顾虑，也不对。一般的讲老干部是受过考验的，经验比较完全，立场比较坚定，是非比较明确，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有感情，但并不是没有毛病。三个主义主要是表现在领导干部和老干部身上。因此，一方面应该爱护老干部，向他们学习，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揭发，这也是爱护他们。如果采取你是老干部什么都好的态度，那反倒害了这些人。这一点顾虑也不应该有的。对老干部的毛病多批评，并要坚决斗争，不是对他们不起，正是爱护他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

所以无论是领导干部也好，青年同志也好，这些怕，这些顾虑都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打破的，可以打破的。把这些问题想通了是应该不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党脱离群众，那是危险的。每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干部、都应该怕

这一点。还有一怕就是党性不强，对于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国家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责任心不强。个人打算，生怕自己在这个斗争中受了损失，看到错误不讲，看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反对。这对共产党员说来叫做党性不强，对革命干部说来叫责任心不强，叫做对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不负责任。领导干部怕提意见，丧失威信，丧失面子，丧失自己的地位，只顾虑个人的得失，不愿意把错误向人家公开，这也是觉悟不强，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至上。这也就叫做没有政治，没有立场，叫作腐朽的自由主义。

大家动员起来，积极起来，团结起来，埋葬三个主义，争取整风运动获得全部胜利！

想三个主义进攻，究竟进攻人还是进攻事？这不能截然分开的。因为事是人做的，可以用事联系到人，也可以用人联系到事。方法还是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大争大辩。所以，我们公安部党组、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毛主席三中全会的指示，小平同志的报告，要继续整风。把三个主义统统烧掉，统统埋葬起来。我们号召大家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按照中央的指示，认真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争取整风运动的全部胜利！